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 国外马克思主义 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14



人民出版社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14

 人民出版社

策划编辑:崔继新

责任编辑:曹 歌 余 雪

封面设计:王春峥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14/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中心 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

ISBN 978-7-01-017651-2

I. ①当… II. ①复…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现代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现代 IV. ①A81②B0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0872 号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14)

DANGDAI GUOWAI MAKESIZHUYI PINGLUN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75

字数:342 千字

ISBN 978-7-01-017651-2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14)

**The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Fudan University**

Editor-in-chief

Wu Xiaoming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Wang Xingfu Zou Shipeng

Edited by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Published by

Renmin Press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顾问：

海外：(以字母为序)

Tony Andréani[法]

Iring Fetscher[德]

F.R.Jameson[美]

Francette Lazard[法]

David Mclellan[英]

Bertell Ollman[美]

John Rosenthal[美]

Jacques Bidet[法]

Agnes Heller[匈]

Georges Labica[法]

Michael Lowy[法]

Juergen Habermas[德]

John E.Roemer[美]

国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

韦建桦

伍伯麟

庄福龄

刘放桐

李其庆

余源培

杨春贵

陈占安

陈先达

秦绍德

顾锦屏

徐崇温

黄楠森

陶德麟

靳辉明

主 编：吴晓明

执行主编：汪行福 邹诗鹏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东	王德峰	朱立元	朱钟棣	衣俊卿
冯 平	孙正聿	孙承叔	孙 辉	李瑞英
吴 松	吴晓明	何 萍	张一兵	张晖明
张 雄	余文烈	陈学明	陈振明	林尚立
杨 耕	汪行福	邹诗鹏	俞可平	袁 新
顾海良	梁树发	韩庆祥	韩 震	童世骏
曾枝盛				

目 录

第一部分 卢卡奇研究

作为列宁主义哲学家的格奥尔格·卢卡奇 [斯] 齐泽克 (3)

何谓悲剧的“形而上学”? ——卢卡奇《悲剧的形而上学》

中的浪漫主义与德国观念论 陆凯华 (35)

探析杜威与卢卡奇在实践问题上的内在关联——以两者

对康德哲学二元论的批判为视角 肖根牛 (52)

第二部分 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理论研究

对现代性的审美救赎? ——论《启蒙辩证法》的三重

辩证结构 段醒宇 (71)

内在自然的牺牲与反动——《启蒙辩证法》的身体

维度 宋一帆 (93)

阿克塞尔·霍耐特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重构 陈 曲 (113)

民族事务治理的“德治与法治”——基于霍耐特承认

理论的视角 张 琳 王永和 (134)

福利国家的现代性——读克劳斯·奥菲的《现代性

与国家》 谢 静 (150)

朝向批判的正义理论——论艾利斯·扬对传统正义

理论的批判 孙秀丽 (162)

第三部分 激进理论前沿

- 作为革命武器的哲学——马克思穿越阿尔都塞 … 西蒙·乔特 (179)
- 阿尔都塞的因果性理论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 …… 张 寅 (198)
- 奈格里“生命政治劳动”之倒转 …………… 李春建 马 丽 (212)
- 真理程式:巴迪欧论政治平等何以必要与可能 …………… 张莉莉 (230)
- 大众、理性与生命政治——激进左翼理论有关斯宾诺莎
复兴中的几个论域 …………… 张 炯 (245)

第四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

摩拉维亚基督教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兴起:

- 一个案例研究 …………… [澳]克里斯蒂娜·彼得森 (263)
- 从安息日—主日的意义看马克思的“自由劳动” …………… 戴 劲 (278)
- 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谈起——兼论对哥德曼“信仰即
打赌”思想的新思考 …………… 刘 芳 (296)

第五部分 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皮凯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利润率

- 下降规律 …………… [美]汤姆·洛克莫尔 (315)
- 从皮凯蒂的《21 世纪资本论》再思马克思的
资本概念 …………… 伍 洋 (331)
- 剥削、不正义和社会变革——以埃尔斯特对“剥削”的
双重意义的阐释为视角 …………… 孔 慧 (341)

第六部分 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

德国“理解”传统的启示——阿隆前期历史哲学的

- 核心 …………… 郝春鹏 (359)
- 阿尔弗雷德·舒茨对社会科学的理解方法的现象学
阐释 …………… 刘剑涛 (381)

第一部分 卢卡奇研究

作为列宁主义哲学家的格奥尔格·卢卡奇

[斯]齐泽克 孙一洲 译 张双利 校

译自《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辩护——尾随主义与辩证法》

(*A Defenc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Verso, 2002)

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一个为数不多的真正事件。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将这本书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遗产加以体会——难以恰当地想象它的面世对于数代马克思主义者造成的创伤性冲击,包括对之后热月阶段的卢卡奇本人,即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都不顾一切地试图与之划清界限,将这本书局限在仅仅是历史兴趣文件的范围。他仅在1967年让步,允许再版并附上了他新写的一篇自我批评式的长篇介绍。直到此次“官方”再版以前,这本书都以一种“不死”之身地下幽灵般的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大学生中间流传着盗版,可用的也仅是一些稀有译本(比如1959年那本传奇般的法文版)。在我的祖国,业已作古的南斯拉夫,提及《历史与阶级意识》,它充当的是围绕在《实践》杂志的整个批判马克思主义圈子的仪式性象征——它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攻击对拒斥以“反映”论为核心教条的“辩证唯物主义”至关重要。这次冲击并不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圈子内:甚至海德格尔都明显深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影响,因为《存在与时间》中有一些明显的线索——比如,在末尾的段落中,海德格尔显然为了回应卢卡奇的物化批

判,而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早就知道,古代存在论用‘物的概念’进行研究,而其危险在于使‘物化的意识’。然后物化(Verdinglichung)意味着什么?它源自何处?……对于基础地展开存在论问题的讨论,‘意识’与‘物’的‘区别’究竟够不够?”^①

—

那么《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如何因获得了这一准神话式禁书的仪祭地位而备受推崇的呢?相比而言,也许,其造成的创伤性冲击较《保卫马克思》也不遑多让——那本由卢卡奇的后辈,伟大的反黑格尔立场的对手^②——路易·阿尔都塞所写的作品。当然,首先跃入我们脑

①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63, p.437.

② 在此我再次想起了我的个人经历:人们可以笼统地说,在共产主义政权的最后二十年,两种哲学路向支配了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生活:反对派中的海德格尔主义和“官方”的党的圈子间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所以,人们可以想象得到,主要的理论斗争都发生在两种路向之间,而第三板块——我们这些拉康主义者和阿尔都塞主义者,在一旁无辜地看热闹。然而,一旦争论爆发,两条道上都凶狠地攻击同一位特殊的第三方作家——阿尔都塞。在70年代,阿尔都塞实际上成了一个病灶,一个适用于所有“官方”对手的代名词。“官方”包括斯洛文尼亚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者,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实践派哲学家和意识形态中心委员会,他们突然之间操持同样的语言,发起同样的指控。在一开始,斯洛文尼亚的拉康主义者的出发点,是观察这次“阿尔都塞”这个名字是如何引发了来自所有阵营的神秘不安。甚至有人试图提出,阿尔都塞私人生活中的不幸(扼死他的妻子)扮演了一个广受欢迎托词与“现实的一小部分”的角色,被他的论敌用来压抑他的理论所代表的创伤(怎么能把一个扼死老婆的家伙的理论当回事?)这份对阿尔都塞的过度抵抗,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其特点是深度的病态,证明了特别是被诋毁为典型斯大林主义的阿尔都塞理论是如何被当作“自发”理论工具,以有效地摧毁了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政权:他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工具的理论指定了对“外在”仪式和实践的意识形态再生产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让“内在”信条和信仰叨陪末座。还有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对“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中这些仪式的核心位置倾注注意?被纳入其中的是表面的服从而非内在的信仰——服从于所服从的表象,这就是为什么唯一变得真正“颠覆性”的方法是“天真地”行动,让系统“咽回它自己的语词”,也就是说,去摧毁它意识形态持续性的表象。

海的答案是,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整个西方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开山之作,这是一部把介入性的革命的立场和那些重要的主题结合在一起的著作,这些主题后来被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不同流派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发展和延伸(将“商品拜物教”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结构特征的观点,“物化”和“工具理性”的观点,等等)。然而,加以仔细观察,事情又有些许不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断裂——准确地说,是卢卡奇从1915年至1930年前后的作品,包括他写于1924年的《列宁》以及其他一系列写于这一时期却未被收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论文,这些文章后来大多收入了他于60年代所发表的《策略与伦理》。除此之外,还有现在的这本题为《尾随主义与辩证法》的手稿,该手稿是他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批判的直接回应。在上述所有这些作品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从我们的西方“后政治”视角看,《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悖论在于,这是一部哲学上极为繁复的作品,一部能够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其时代思考的最高成就相媲美的作品,同样也是一部能彻底扎根于当时政治斗争的作品,一部反映作者作为激进列宁主义者的政治经历的作品(毕竟,卢卡奇曾在1919年贝拉·库恩那短命的匈牙利共产主义政府任文化部长)。^① 悖论也由

自相矛盾地,出于阿尔都塞与卢卡奇这两种马克思主义中任何一方看来,另一方都以典型斯大林主义的方式面世:对于阿尔都塞和之后的阿尔都塞主义者而言,卢卡奇对共产党是准黑格尔主体的观点赋予了斯大林主义正当性;而对于卢卡奇的追随者们而言,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理论的反人道主义”,以及他对整个异化和物化有问题的拒斥,给了斯大林主义者忽视人的自由以可乘之机。在此不好详细介绍这一争论,这样已足以强调出这两种马克思主义都如何清晰表达出一个受反对者视野排斥而关键的问题:对于阿尔都塞,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充当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的观点;而之于卢卡奇,则是历史的行动这一观点。还有,当然,要实现这两种相互排斥的路径的综合并不容易,也许必须将借助参考安东尼奥·葛兰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

① 因此《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标志着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前的早期卢卡奇的彻底断裂,此前他的主要作品是《小说理论》,从属于韦伯的社会文化批判传统。这就不奇怪他在这本书中署名格奥尔格·冯·卢卡奇!

此而来,相比“标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更加公开参与政治的同时,在哲学上更符合思辨黑格尔主义(参见其视无产阶级为历史的主体—客体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们总是与这一观点保持着不安的距离)——如果说的确有关于列宁主义与列宁主义政党的哲学家,那么早期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就是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的,他甚至对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著名批判进行了坚决批判,明确为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年的“不民主”辩护,指责卢森堡陷入了对形式民主的“盲目崇拜”,不明白“形式的民主”只是一种由我们根据具体革命形势的需要来决定取舍的革命策略。^①今天我们要特别反对的就是忽视卢卡奇思想的这个方面,把卢卡奇贬低为一个中产阶级和去政治化的文化批评者,认为他只是在提醒人们注意“物化”和“工具理性”,而这些主题早已被吸收进了保守主

① 当然,如果可以玩重写历史的游戏,大可猜测,如果列宁读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他会以“主观主义”与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认识论否定其哲学前提(已经颇有象征意义的是,为了保持它的列宁主义凭证,卢卡奇事实上忽略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另一方面,在列宁的所有写作中,只提过卢卡奇一次:在1921年,在为《共产主义》杂志这一东南欧共产国际机构写的一篇短文中,列宁参与了卢卡奇和贝拉·库恩的辩论,凶猛地攻击卢卡奇的言论“非常左且非常糟糕。在其中马克思主义只停留在纯粹口头的水平”(参见V.I.Lenin,“Complete Works”,*Russian Edition*,vol. 4,pp.135-137)。当然,这也不妨碍卢卡奇是个彻底的列宁主义哲学家:更应该是列宁本人当时也没充分意识到他在自己的革命工作中所“实践”的革命立场,并(通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阅读黑格尔)才逐渐开始意识到这点。当然,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次对一人的真正哲学立场的误解对它的政治参与是否必要?换言之,吕西安·戈德曼在他名作《隐蔽的上帝》中,就帕斯卡和冉森派(同样不见容于统治的天主教圈子)建立的关于统治意识形态如何必然地否认它的真实基本前提的这一规则,是否对列宁主义同样适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如果列宁对其哲学前提的误解是结构上的必要,那么列宁主义不过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而卢卡奇对它的重视,即使是真的,也不够充分:它能渗透到列宁主义的真正哲学前提,但它不能解释真相和表象之间的特别裂缝,意即在错误(客观主义、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列宁主义自我意识中对真相的必要否定——如卢卡奇本人清楚地知道(这正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个最伟大的黑格尔主义理论)。表象从来不只是表象,而是作为表象的本质。

义批判者们对“消费社会”的批判。

所以,恰恰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奠基性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个传统中处于一种“例外”的位置。在这一点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地位刚好印证了谢林的观点,谢林曾经指出,“开端就是对那个以其开始之物的否定”^①,那么,这一“例外”的位置又根基于何处呢?在20年代中期,那个被阿兰·巴迪欧称之为“1917事件”的潜力已开始枯竭,这一进程接着就转向一次热月回潮。这一阶段不仅以一般的托洛斯基的方式(革命被一个新的官僚阶层背叛)所考虑,而且被巴迪欧在“严格意义上加以叙述”^②:作为事件的中断,这并非是一个特定社会集团和/或其利益的背叛,而是对(革命的)事件自身的忠诚的背叛。在苏联热月党人看来,事件及其后果变得难以理解,“毫无理性”,要驱散这个集体陷入疯狂的噩梦——“我们都深陷于一个陌生的毁灭性旋涡之中……”

伴随着“1917革命序列”(巴迪欧语)的停滞,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样的直接的理论—政治的介入(theoretico-political engagement)已不再可能。社会主义运动决定性地分裂成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改良主义和新斯大林正统,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避免公开地支持这两者的任意一支,抛弃了直接参与政治的立场并变成了业已成立的学术机构的一部分,其传统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化研究。这正是使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与20年代的卢卡奇相互分离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另一方面,苏联的官方正统哲学逐渐采取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形式,辩证唯物主义成为赋予“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热月党苏联正统在哲学上崛起的一个特别标志是其对卢卡奇和他的理论战友卡尔·柯尔施的一系列恶毒攻讦。后者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堪称《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姊妹篇,两

① EW.J.Schelling, “Sämtliche Werk”, ed. K. F. A. Schelling, Stuttgart: Cotta, 1856 61, vol. VIII, p. 600.

② Alain Badiou, *Abrégé de métapolitique* (Chapter 9), Paris: Seuil, 1998.

本书甚至都在同一年(1923年)出版。这一蜕变的分水岭是于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这是列宁去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也是人们明确承认欧洲革命已经终结、社会主义不得不在俄罗斯独自存在^①这一现实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季诺维也夫在此次会议上对卢卡奇、柯尔施和其他“教授”进行了猛烈攻击,其攻击极具蛊惑性并有强烈的反智主义倾向,他轻蔑地提及卢卡奇等人,声称这批教授代表着一种极左背叛。在这一点上,他与卢卡奇在匈牙利共产党的同僚拉茨洛·鲁达斯完全一致,后者对卢卡奇的“修正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此后,对卢卡奇和柯尔施的主要批判来自于阿·德波林和他的哲学学派,他们是当时苏联的主流学派(虽然之后因“黑格尔唯心主义”被清洗),首先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普遍的辩证的方法的观念,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详尽阐释了能应用于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如此,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就被剥去了其直接干预性的、实践的革命的态度,被转变为处理科学认识普遍规律问题的一般认识论。

正如柯尔施在这些辩论之后所指出的,这些辩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无论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批判,还是来自于“修正主义”社民党圈子的批判(后者是共产国际的名义上的敌人),它们实际上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反驳,他们被卢卡奇和柯尔施的共同观点所触怒,谴责其理论是“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介入的特点等)。当马克思主义已变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介入性的立场就不再

① 顺便一提,十月革命的早期岁月的教训在根本上和今日的后毛主义中国一样: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家,更应该坚持市场和民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只有随着稳定的财产关系,民主和市场才得以并行:当它们被扰乱时,我们可能得到皮诺切特独裁时代智利或一次革命爆发。这就是说,被强调的矛盾在于,在又一次为市场的“自由开放”打开空间的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前那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艰难岁月里,苏联比新经济政策时期要民主得多。新经济政策的市场自由开放的实施,与干部们的强大政党获得对整个社会的掌控一起大步向前:这个党的崛起,恰恰是对于市场的公民社会的自治权的反应,处于掌控这些的不受羁縻社会力量的目的而建立更强的权力结构。

被允许,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使命是以非历史的(所谓“普遍的”)、辩证法规律的形式为政党的政策决定提供正当性。颇具象征意义的是,此时人们又突然开始重提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对于卢卡奇和柯尔施乃至对于马克思而言,根据其定义,“世界观”指意识形态的“直观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介入性的理论正是要与这种立场彻底决裂。

茨维尔德(Evert Van de Zweerde)详细地阐发了作为“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苏联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①:虽然它自称是一种意识形态,但事实上却不是其所声称的那种意识形态。它并不动员群众,而更多用于赋予政治行为正当性;它不被人们真正相信,只是被仪式性地宣布;它声称是“科学的意识形态”,因而是对社会环境的“正确反映”,这只是为了排除在苏联还存在着一种以“错误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的“普通”意识形态之可能性;等等。如果我们将臭名昭著的“辩证唯物主义”(diamat)当作一个纯粹的哲学体系来看待,那我们就彻底没把握住要点:它是被仪式性地用来支撑既定权力的正当性的工具,因此它应该在权力关系的复杂网络中被准确定位。对于这一点,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伊利延科夫(I. Ilyenkov)和洛谢夫(P. Losev)的不同命运,他们分别代表着社会主义制度下俄罗斯哲学的两个蓝本。洛谢夫是苏联出版(1929年)的最后一本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将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明显的废话”而加以摒弃)的作品的作者;但是,他在短暂的人狱后就被允许继续他的学术生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被允许继续授课——使他得以幸免的“解决方案”是:他彻底地退回到作为一个专业学科的哲学(美学)史领域中,专门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作者们。以译介过去的思想家,特别是普罗提诺和其他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为名,他能够一方面在著作中“偷运”自己的唯灵

① See Evert van der Zweerde, *Soviet Historiography of Philosophy*, Dordrecht: Kluwer, 1997.